

自1949年以来, J.P.雅各布森的小说尚无汉译出版,但早在1936年,翻译家伍光建就选择了他的长篇小说 *Niels Lyhne*, 译名为《尼勒斯莱尼》,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丹麦短篇小说集》中,则收录了 J.P.雅各布森的短篇小说《芳斯夫人》,译者署名“金桥”。这位“金桥”就是赵平复(1902.9.28—1931.2.7),多以另一笔名“柔石”为人所知。

根据柔石日记的记载,早在就读于浙江第一师范学院的1922年,他便已有阅读英文原著和外国文学译文的习惯,其中包括英美“公民读本” *Ture Citizen*, 郭沫若翻译的歌德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书目。但他着手于翻译工作,则是在1928年赴上海与鲁迅结交之后。鲁迅素重翻译,希望通过翻译从别国“窃火”,“别求新声于异邦”,既以此输入新的精神,改造“国民性”,又通过译文孕育出一种新文学的语言。他鼓励青年作者从事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学习和尝试文学创作,他在1925年于北京发起的未名社,就是一个以译介外国文学为主的社团。1928年11月,鲁迅又在上海发起成立朝花社,主要成员有柔石、许广平、崔真吾、王方仁等,宗旨是“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朝花社创办了《朝花周刊》,1929年改为《朝花旬刊》,并附出《艺苑朝华》画刊介绍近代木刻作品。柔石以他对美术尤其是木刻艺术的喜爱和了解,成为鲁迅之外的另一位主编者,编印了两辑收录英、法、美、德、日等国作品的《近代木刻选集》和专门介绍苏联版画的《新俄画选》。此外,还出版了《朝花小集丛刊》《北欧文艺丛书》和《近代世界短篇小说丛书》。

以此为契机,柔石开始了他的翻译工作。虽然曾在1923年9月之后学习过法语,但柔石的翻译皆是从英文原著译出,或是根据英译文再度转译,事实上,后一种情况占绝大多数。与鲁迅不同,柔石极少写作序跋文字对他的译作进行介绍说明,因此其译作的选择原因、推介的着眼点也就不甚明了,然而我们仍能够根据相关信息对柔石的译文选择路径进行一种推测性的理解。

柔石选择翻译对象的视野和范围,显然受到鲁迅的重要影响。从现实层面上说,他译文的发表和出版也需要符合丛书或文集的出版计划才能获得支持。总体而言,他的译作主要是北欧和东欧作家的作品,以及一些同属于“弱小民族文学”如南斯拉夫地区作家的作品。

柔石翻译的北欧文学作品,主要是丹麦作家的短篇小说,此外还有一篇比利时作家拉蒙尼

1931年春天,鲁迅先生为沉痛悼念左联五烈士,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中写下:“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表,在污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股夫作为左联时期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诗人,是左联五烈士中最年轻的一个,牺牲时年仅22岁。

他的代表作品之一《别了,哥哥》,写于1929年4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之“四一二”反革命改变两周年之际。诗中,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地袒露了自己要同身为国民党军队高级军官的大哥决裂,宣告要与这个反动阶级代表人物从思想上、政治上的彻底决裂,字里行间,掷地有声,仿佛一个大刀阔斧从叛逆旧社会走来,走向革命的勇士,他昂首挺胸,毫无畏惧地甩着自己的臂膀,放出这些豪言壮语,仿佛刚刚挣脱锁链一般轻盈自在。流露于他笔尖的,是对兄弟之情的忍痛割舍,更是他一往无前进行革命斗争的誓词,是他从一个孩子,真正成为革命战士的冲锋号。

“不能留住我不向你告别”

他感慨哥哥“20年来手足的爱和怜,20年来的保护和抚养”。股夫是家中幼子,年长他15岁的大哥从小给予他父亲般的关爱呵护,是他曾经最亲密的人。民国九年,11岁的股夫考取了丹城象山立第一高等小学,他的大哥徐培根曾是这所学校第一期的第一名毕业生,母亲钱月嫦想把心爱的幼子托付给大哥,希望大哥能够“长兄代父”,全力照顾股夫上学读书,帮助他长大成才,而徐培根也对年幼的股夫寄予厚望,期盼他学业有成,光耀门楣。民国十二年,从北京陆军大学毕业的徐培根,已被分发至浙江第一师任少校参谋,时值股夫小学毕业,于是他便返回故里,把母亲和小弟股夫一同带去了杭州。同年股夫又奔赴上海,考取了上海立民中学新制初级中学。可以说,早年的股夫,是倚仗了大哥徐培根,离开了那偏僻故乡,领略到了一代古都杭州的恢弘气象,跃入了光怪陆离的“十里洋场”,这些他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急剧变化着的一切,使他耳濡目染,激起了他追求知识与生命真谛的强烈欲望。

民国十五年,股夫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立民中学毕业,大哥十分关心他的学业和未来打算,便唤他至杭州团聚,一家人共同商议。大哥徐培根一直想

柔石翻译小论

□李星辰

(Camille Lemonnier)的《维埃之魂》。他和淡秋合译的《丹麦短篇小说集》与鲁迅译挪威哈谟生的《维多利亚》、梅川(王方仁)译的《瑙威短篇小说集》、崔真吾译的《瑞典短篇小说集》共同组成朝花社出版的《北欧文艺丛书》。朝花社同仁之所以关注于北欧,不仅是由于北欧比之英法等西欧国家相对弱小,而且考虑到由于地理、语言、文化传统等原因,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为主体的北欧的文化与文学发展出不同于希腊—希伯来文明传统下欧洲大陆主流的独特风格。在北欧文学中进一步关注到丹麦文学,则与19世纪丹麦著名文学评论家勃兰克斯对丹麦文坛乃至中国文坛的重大影响有关。

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小说月报丛刊第三十一种”之《近代丹麦文学一裔》中,收录了沈泽民翻译的亨利·哥达·伯赤的《近代丹麦文学——勃兰特底前后》一文,这篇文章较早对勃兰克斯进行了全面介绍,而且被后来者反复引述,文中概括了勃兰克斯的主要文学主张:“勃兰特希曾借鉴于欧洲文学来促进丹麦的一般少年作家。他激烈的主张:国内的旧文学已经死了,或者差不多要死了,国内的文学已经变成太矫揉造作,太不切合人生了。文学要他有生命,一定要直接和人生往来,解释人生中各个问题……把社会底真相揭露出来。”不难想象,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从勃兰克斯的文学主张中得到了强烈的共鸣。勃兰克斯将写实主义潮流引入丹麦,使丹麦成为“国际新思潮所必由的河道”(《丹麦短篇小说集·英译序》)。在这一意义上,丹麦文学对于中国新文学的意义类似于同样具有“中介性”的日本。由此,关注勃兰克斯前后丹麦文学尤其是写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实绩,对于正在生长的中国新文学而言,就相当具有借鉴意义。

《丹麦短篇小说集》中收录的小说,大多数是受到勃兰克斯激赏和鼓励的作家的作品,他们以写实主义的创作打破既有的文学传统,共同造就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而这些作家们又各具特色,绝非同质,显示出丹麦短篇小说创作的丰富性。以柔石翻译的几篇小说作品为例,布力协(S.S.Blicher)的《凡尔培的牧师》以两位叙事人日记的形式讲述了一个情节多次反转的犯罪故事,使一位法官的案件审判与未果的婚姻双线交织,在动人心魄的故事中展现出人性之

恨……”。当时涉世不深的股夫被大哥的话惊呆了,只觉震惊与疑惑,深不知这是大哥对其衷心的劝诫。果不其然,没过几天“四一二事变”便爆发了,在浦东中学因一个小小的告密,股夫被捕入狱。在监狱被囚禁了3个月,险遭枪决,他终于找到办法买通了狱卒,寄信给当时在南京的大哥徐培根寻求帮助。此时的徐培根即将配派往德国陆军大学留学,收到小弟的来信后,便随即告假赶至上海,保释股夫出狱。徐培根带着小弟及一家老小返回象山,将他们安置好后便返南京,准备赶往德国。受到大哥的督促,股夫专心复习功课,同年他凭借来的高中文凭考取了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班。在学期间,进入德国陆军大学的大哥依旧心系股夫,经常从柏林寄来德文书刊,以助他学习德文。那向往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便是由股夫翻译德国诗人彼得非诗集而来,而这本后来被鲁迅收藏的诗集,第二页上便有徐培根的签名。

一面“饥渴着永久的真理”,一面是哥哥的“二十年来的手足的爱和怜,二十年来的保护和抚养”,一句句“不要胡闹”的告诫。然而第一次牢狱之灾丝毫没有影响股夫的革命热忱,民国十七年夏天,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股夫第二次被捕入狱,大嫂得知消息后,赴上海托人照应,好不容易才将股夫保释出狱,将他带回老家象山。大哥徐培根常在经济上接济困窘的股夫,并一再写信劝告或“训令”,要他“觉悟”过来回到自己身边。而股夫没有再回同济继续学业,不再“进去听指示的圈套”,毅然决然地摆脱了大哥为他精心安排的“安逸、功业和名号”,不要“治者们荣光的爵禄,或是薄纸糊成的高帽”,“不要荣誉,不要功建”。几经波折与流浪,股夫在民国十八年3月,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开始专职从事共青团工作和青年工人运动,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出于同胞手足之情,大哥给他发去一封封信,劝他放弃危险的工作,哥哥的来函促成了股夫与哥哥及其所属党营决裂的决心,于是他写下《别了,哥哥》,决心挣脱羁绊,全身心汇入革命的铁流中,“独立地向前途迈进”。

“这,就是你弟弟的前途”

民国十四年6月,在五卅运动爆发后,中共中央会议决定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作为全市反帝运动的统一领导机关,将运动迅速推广到全国各地,城

光与人性之恶的极端形态;雅各布森(J.P.Jacobsen)的《芳斯夫人》则塑造了一位独特的母亲形象,她以自己在婚姻中的勇敢选择实践自由自主,对于当时的丹麦和当时的中国而言,都足以形成一种震动和启示;邦格(Herman Bang)的小说《在罗森公园内》则典型地符合勃兰克斯的箴言“文学应该是生活的横断面”,他的小说有着“散文化”的倾向,以“印象派”式的文字观察和表现生活中习见场景中的不寻常之处;哲孙(Johannes V. Jensen)的小说《安和她底牝牛》以近乎自然主义的精密、细致的描写不动声色地传达出人物的孤独和悲哀,几乎没有情节,但仍在文中保持着悬念,《失去的森林》则颇具象征性和寓言性,通过一位女主人和它想要重回森林的奴隶的故事,既讲述了一种现实境况,又暗示着人类在追寻“失去的森林”时的一种永恒困境——以哲孙为代表的来自遮特兰半岛(现多译作“日德兰半岛”,与欧洲大陆相连)的青年作家对19世纪丹麦的写实派提出了一种反动,他们要求表现哥本哈根之外遮特兰本地的乡土生活,实质上丰富了写实主义的创作成果,亦可为中国乡土小说的发展提供一种借鉴。

三

鲁迅提倡译介东欧尤其是苏联文学,除了为了文艺上的借鉴之外,还出于现实革命需要的考虑,希望借此“偷运军火给起义的奴隶”。柔石积极参与了这项事业,他对东欧文学作品的翻译主要包括 A.V.卢那卡尔斯基(1875—1933)的剧本《浮士德与城》、戈理基(即高尔基,1868—1936)的长篇小说《亚尔泰莫诺夫事件》(亦名《颓废》),以及收入朝花社出版、鲁迅主编的《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之《竖琴》的两个短篇小说, M.淑雪兼珂的《老耗子》和 V.凯泰耶夫的《“物事”》,亦皆从英译版转译而来。后两篇小说都颇为短小,淑雪兼珂的作品有些流于“轻巧”、“滑稽”(鲁迅语),凯泰耶夫在小说中塑造了漫画般的夸张人物;而前两部作品则是柔石的重要译作。

作为一位苏联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那卡尔斯基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在左翼文学运动期间尤其掀起了译介其著述的高潮,冯雪峰、鲁迅均有译作,但主要集中

市和农村中去。立民中学校长响应中央号召,宣布罢课,当时的少年股夫早已置身于这场汹涌的反帝浪潮中,同时结识了象山进步文艺团体“新新社”的成员,他们创办的刊物《新新社》,专门用于发表抨击封建教育、旧礼教和揭露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文艺作品,股夫被邀请加入了社团,并相约一同回乡搞运动。他们以五卅运动亲历者的身份激情演讲,敲锣打鼓、呼喊口号,唤起了民众同仇敌忾之心,很快将运动推向高潮。经历了五卅运动之后的股夫,感到自己长大成熟了许多,共产党宣传的革命理论新思想在他的体内蓬勃滋长,直到他进入浦东中学后,多次与象山县立高等小学的同乡同学贺咸圣、杨白等共产党人会面,自觉积极地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发生联系,身体力行地想要做个“普罗米修士”,如诗中写道的那般,要“偷给人间以光明”。

“四一二事变”爆发,蒋介石发布了上海市戒严令,上海市总工会发布全市总同盟罢工的命令,工人、学生和市民纷纷举行大规模的抗议集会,正是在这个时候,股夫亲眼见证了蒋介石军队疯狂屠杀人民群众的残忍一幕,凡被认是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均难逃一劫,一时之间白色恐怖弥漫了其目光所至的每一处。股夫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被捕入狱。体验到监狱的可怕,预感到死亡的逼近,“机械的悲鸣扰了他的美梦,劳苦群众的呼号震动心”,他日日忧愁,为自己未尽之责任而感惭愧。然而黑暗并未束缚住他自由的手脚与灵魂,他蔑视反动派的阴险、毒辣,却也憧憬着暴风雨后艳阳天的到来。进入同济大学的股夫继续投身学习,以笔为利器,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奋战到底,直至再一次被捕。因为他深信“真理的伟光在地平线下闪烁,他的恐怖都辟易远退,热的火会把冰雪溶消。”诚如雪莱所歌颂的那样,“寒冬已来临,春天还会远吗?”

民国十八年,革命的热情昂扬激越,他进入了红色鼓动诗创作的高峰时期,便有了《别了,哥哥》。他明知自己只要答应一声,就能够从大哥那里获得一切,“从名号直至纸帽”,但他知晓,那实质才是困住手脚、扼住灵魂的链条。他要那见得了光的真理与正义,宁愿在黑暗里当个自由的勇士,也不愿被利禄捆绑了信仰。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和《白莽作〈孩儿塔〉序》中回忆股夫第三次出狱后与他的见面时说,股夫“穿着一件厚棉袄,汗流满面,彼此都不

在其文艺理论方面。柔石所翻译的《浮士德与城》则是一部十一幕剧本,实质上是以另一种形式传达他一贯的思想观念。《浮士德与城》被英译者看做是“俄国革命程序的预想”,鲁迅以为这也是作者对“世界革命的程序的预想”(《〈浮士德与城〉后记》),剧本从歌德《浮士德》第二部启发而来,讲述的是浮士德在“自由之城”的情形,他希望对“自由之城”进行开明的专制统治,然而在民众的反对下退下皇位,最终悔悟,认同“民主”,在民众的歌颂中死去。与激进的、破坏一切的革命主张不同,这部剧所提请注意的是对文化遗产、旧有制度进行保存的意义,这并非主张与革命之路背道而驰的“复古”,而是体现出对文化遗产之于当下乃至后世的意义更深刻的认识。这部剧译于1930年9月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列为“现代文艺丛书”之一。

根据柔石日记的记载,他于1929年10月1日起开始翻译戈理基的长篇小说《亚尔泰莫诺夫事件》,但译稿在柔石去世后的1934年3月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题目改为《颓废》,译者署名为“赵璜”。小说以一个俄国新型资产阶级家族三代为聚焦,展现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图景,是一部典型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此外,柔石还翻译了高尔基的《关于托尔斯泰的一封信》和《托尔斯泰的回忆》,收录于1932年光华书局出版的《高尔基文集》之中。

在北欧、东欧作品翻译之外,值得一提的是,柔石在1929年初还翻译完成了三篇南斯拉夫小说,皆收入于鲁迅所编“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2《在沙漠上》。这三篇小说的内容和形式皆颇具特色:麦士斯(Antun Gustav Matos, 1873—1914)的《邻舍》通过内视角的叙事,以一个戏剧化的故事深切地表现出作为异乡人尤其是“弱国子民”在巴黎的孤寂处境,国族的界限成为个人情爱幻灭的根由,似乎可以与郁达夫《沉沦》发生某种共鸣;伊凡·开卡(Ivan Oankan, ?—1919)《孩子们与老人》以小孩们童稚的谈话与他们所不能理解的战争与死亡,更增一重悲哀,亦更增一重反思,作者极具表现力的语言在两层转译之后仍然具有动人心魄的魅力;拉柴力维基(Laza K. Lazarevich, 1851—1890)是塞尔维亚最著名的作家,他的《井边》以家族生活中的一段最著名为题材,是一篇具有人性深度的作品。无论对于柔石本人还是对于当时的中国文坛而言,

禁失笑”,他告诉鲁迅自己“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他还说道:“这是第三回了,自己出来的。前两回都是哥哥保出,他一保就要干涉我,这回我不去通知他了”,可见他已决意与哥哥“此后各走前途”。

“再见的机会是在,两人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

得知股夫数次被捕后,大哥徐培根又气又急。民国十九年春,股夫收到大哥寄来的一封信《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信中语气暴怒地责备股夫一再欺骗他,对他“完全没有信用了”,也许是期盼股夫看了信后也许会忏悔,岂知不仅没有如此,股夫还以一封公开刊登在《拓荒者》上的《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阐明自己坚定不移的阶级立场,“我和你相互间的系带已完全割断了……只因为我和你是两个阶级的成员了。我

和你也只有兄弟地位上愈离愈远,在敌人地位上愈接近的了。”最终的结果,也确如股夫所写的:“再见的机会是在,两人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后一年,包括股夫在内的龙华二十四烈士就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于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股夫深知,当他决定要“向别方转向”之日起,就已被他所隶属的集团决定了前途,道路虽暗,却心灵自由。

这些此前少为人注意的作品之中实则包孕着别样的风景与启示,虽是短篇,却可“藉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在沙漠上〉小引》),以最经济的方式,展示多样的作家作品和各自的文体风格。

四

若是从译文的语言层面考察,柔石的译作并非上乘佳作。林淡秋曾经在回忆文章中写到,柔石的外语程度较差,因而翻译颇为吃力。但是,柔石译文最终呈现的面貌,却不应仅仅用外语程度来解释。作为一名汉语语言表达能力成熟的作家,柔石在翻译中却几乎不追求以汉语的表达习惯“汉化”原文,而是紧贴原文的句式语法“硬译”——这其中,应当亦有鲁迅“硬译”观念的影响。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我对马丁·勃鲁宣布她们并没有新的发现关于这件案子”(《凡尔培的牧师》)中介词短语的位置,“愿慈悲的上帝审判我更宽仁比我”(同前)中比较句式的结构,“我知道埃珊当他还是一个少年人的时候”(《井边》)中时间状语从句的位置……皆可看出英文原文的句式结构。

从译文效果上说,这种译法固然造成了行文 的滞涩,但是的确如鲁迅所期待的那样,更有利于传达出原作者的独特文风,而不至于被译者自己的语言风格所遮盖。比利时作家拉蒙尼《维埃之魂》中悠长的叹息般的句子,使充满神秘性、象征性和抒情性的氛围弥漫全篇;丹麦作家哲孙《安和她底牝牛》中描述性语言的精密细致,不动声色,拉孙(K.Larsen)小说《农人》行文的朴实朴素……种种风格,都在柔石的译文中传达了出来。

在柔石短暂创作生涯中,无论是抒写个人心志,还是反映社会问题,他的作品极少表现出当时“左翼作家”常有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有论者将其原因归结为柔石的个人气质和生活际遇使然;此外,也不应忽视柔石从翻译中所汲取的多种文学养分。

鲁迅在柔石逝世后为他写作的《柔石小传》中总结其“文学上的成绩”,将柔石的翻译与创作并列为“成绩”的两大部分:“创作有诗剧《人间的喜剧》,未印,小说《旧时代之死》,《三姊妹》,《二月》,《希望》,翻译有卢那卡尔斯基的《浮士德与城》,戈理基的《阿尔泰莫诺夫氏之事业》及《丹麦短篇小说集》等。”柔石的一生中花费了许多精力纾解或抑制自己过于敏感的情绪和过于纷繁的思绪,同时,他又时常有意识地自我劝勉,如他在1922年5月29日的日记中所写:“要模仿肩膀上荷着锄望田中去的农民,或手里执着锤看着铁打下去的工匠才好。”柔石的翻译作品,正是他作为文学的耕种者和工匠的重要实绩。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和你也只有兄弟地位上愈离愈远,在敌人地位上愈接近的了。”最终的结果,也确如股夫所写的:“再见的机会是在,两人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后一年,包括股夫在内的龙华二十四烈士就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于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股夫深知,当他决定要“向别方转向”之日起,就已被他所隶属的集团决定了前途,道路虽暗,却心灵自由。

结 语

鲁迅追忆股夫时称“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股夫所写的以这首《别了,哥哥》为代表的红色鼓动诗,集中地描写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复杂的阶级矛盾,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斗争,彰显出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

(作者单位:余音,东华大学)

丛刊2018年第11期目录

80年代文学研究
孙犁、铁凝的文学传承与当代文学的发展……张 莉
1970年代末期的“精神危机”及其克服
——以刘心武七八十年代之际的创作为中心……周展安

鲁迅研究
当思想革命遭遇国民革命——中期鲁迅与“文学政治”传统的创造……邱焕星
鲁迅中医批判策略的形成与演变……邓小燕
东方逻各斯中心主义:鲁迅语言观的哲学解读
——从《桃色的云》中的译名谈起……李 春
夷齐之死与王国维自沉——鲁迅《采薇》“今典”猜想
祝学红
“执心求味”是艺术哲学——鲁迅《墓碣文》的哲学之一……廖 立

作家作品研究
驯鹿鄂温克人的植物利用及乡土知识:重读《额尔古纳河右岸》……张箭飞
龙门阵里谈出的“革命”:《大波》(1937)的历史叙事……赵 薇
在被遮蔽的历史地表之下
——郭沫若“民间文艺”观历史演变考论…孟文博

文学史研究
《我们夫妇之间》批判的文史探考……袁洪权
胡适、郭沫若、周作人的新文学史叙事策略及话语权之争……张 军

主编:李敬泽 丁帆 邮发代号:2-667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文学馆路45号中国现代文学馆
邮编:100029 投稿邮箱:ckbjb@wxg.org.cn
电话:010-57311619/57311618